

老安的“结束语”和“开场白”

——送别安岗同志

□ 李洪波

4月28日,《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安岗同志在海南与世长辞。灵堂设置在他北京亚运村的家中,夫人樊亢同志告诉我们,4月27日清晨,弥留之际的“老安”睁开眼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报纸呢?”昏迷之后再也没有醒来。这位一生心系报纸、始终牵挂报纸、早起必读报纸的报坛耆宿,就是以这句话作为他卓越人生“结束语”的!

鲜花簇拥,挽联低垂。我们一行踏着轻缓而又沉重的脚步走进灵堂,走近“老安”——30年来,一茬又一茬的经济报人都这样称呼他。党旗覆盖的骨灰盒上端,彩色遗像中满头银丝的“老安”含笑望着前方,也望着我们,似在交付重托:“报纸呢”……恍然间,思绪被拉回第一次见到“老安”的30年前。

那是1982年盛夏的一天,《经济日报》创刊前夕,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报社职工食堂,新到任的总编辑召集新入社的大学生聚谈。我们事前即已得知,安总将在与年轻人见面的场合发表就职演说,谈如何创办《经济日报》、如何当好《经济日报》记者,可谁也没料到他会以那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切入正题

——“同志们!我是安岗,今年六十有四……”刚起头话音便戛然而止,随着他的目光,会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齐齐地落在前排一位正埋头翻阅杂志的小同事身上。“你看的什么呀?”老安低头轻问。阅读者“理直气壮”地答道:“《知识就是力量》!”老安剑眉一挑,不怒自威:“你那‘知识’没有力量!”稍停片刻,又加重语气说,“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从实践中来,对记者而言,就得从采访实践中来;对《经济日报》记者而言,采访中欲知欲识,就得能在被采访对象从大门轰出来的时候勇于从窗户翻进去……”

这就是安岗同志就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开场白”。后来由他详加表述并着力贯彻的一系列办报思想,诸如“办好报纸需要拼搏精神”,“脚底板下出新闻”、“各项事业都要争创一流”、“报社要办系列报刊,办出版社,办电台、电视台(当时尚无网络及‘全媒体’概念)”等等,都是在这段“开场白”后破的题。一席话,顿时把我们这拨那时尚且年轻的经济报人鼓动得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从此在老安等前辈的率领下,抓出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让王府井亮起来”等大批社会反响强烈的

新闻名篇,短短数年间处于创业阶段的《经济日报》即在中国报业之林打拼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这段“开场白”,也可以称作安岗同志系统阐释其办报理念及思路的另一次重要谈话的“引言”。谈话发生在两年后的1985年2月7日下午,美国《华尔街日报》派出一位名叫班妮特的女记者赴京采访安岗总编辑。笔者时任总编室负责人,奉命作陪,于是有了那次对采访的“采访”,有了一份“《经济日报》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访谈记录。

这份记录经整理后我曾呈安岗同志过目,虽已见诸于本报内部刊物,但迄今未公开发表。今天,已届“而立之年”的《经济日报》正朝着“高端权威、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报”发展目标奋力前行,老安当年在《经济日报》告诉《华尔街日报》中表达的,不仅是昭示天下“吾将砥砺奋进”的追求与情怀,也是他对从“开场白”到“结束语”这段经济报人追梦历程的概括与诠释。

走出灵堂,回到报社,我写下悼文,并把28年前的访谈记录作了适量删节并附于文末,以寄托对《经济日报》创始人安岗同志的哀思。



安岗同志

(资料照片)

“要越办越好!”

□ 王茂林

关于安岗,其实以前我并没有多少了解。当我踏进白纸坊东街2号院时,安老早已离休多年。如果不是因为参与拍摄经济日报社庆30周年宣传片的因缘,我想我和安老不会有什联系和交集。在拍宣传片之初,印象颇深的是有人跟我说,要拍《经济日报》的历史,不采拍安岗怎么能行呢?!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说明了安岗在《经济日报》历史上的地位及特殊意义。另外我听到最多的一句就是“脚底板下出新闻”——这是他的新闻采访理念,通俗而朴实,与当下的“走转改”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宣传片拍摄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认识了这位曾经在报界叱咤风云的老人,并有幸在数千里之外的南国亲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对他而言也是最后一次的特殊采访。

2012年12月上旬,社庆宣传片的拍摄制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但对拍不拍安岗很纠结。他每年入冬前都到海南去,等第二年天气转暖的四五月份才回北京。按照原计划,社庆活动要在春节后“两会”前搞,拍片子肯定等不到四五月份了。但如果为了几分钟的采访,摄制组专门乘机换车去一趟海南,是否值得?我找网站主要领导请示,领导态度很坚决:“去海南。联系好,马上走。对这些老人来说,采访就是抢救性质的,要尽量多拍,留资料也值啊!”于是,经报社离退休办协调后,我们摄制组一行3人踏上了海南三亚之旅。

行前做了些功课,知道安老尽管说话表达能力还好,但听力不好,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毕竟90多岁了。临去海南前,我们接到安老子女委托,为其捎带的一箱药品,里面有胰岛素,需要保持低温。我和王主任精心做了包装捆扎。

从隆冬的北京抵达三亚,下了飞机便感觉到一派南国气象。经和安老夫人樊亢联系沟通后,约好12月11日下午3点30分后到家中采访。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他住的碧海蓝天小区附近。初次登门,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专门去买了一提袋海南特有的小香蕉等水果。买完刚一转身,忽然就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等跑到小区楼里,已浑身湿透。

先见到了和蔼的樊阿姨。她快90岁了,看上去身体挺好。跟樊阿姨上到6楼,一个比较狭小的一居室,一个护工阿姨住在小客厅里,陈设简单。屋里没有足够空间,我们只能安排在楼下的室外进行采访。我们先下楼挑了一个绿树草坪的背景,一会儿护工把轮椅上的安老推了过来:白头发,白衬衣,浅黄色裤子,黑布鞋——一个你在街边小院随时可以见到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小老头。

采访时,我需要对着安老的耳朵大声地说他才能听清。采访断断续续,安老的声音挺大,不时说到“经济日报”、“王府井”、“北京”、“国家领导人”等字眼,吸引了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驻足围观。谈到《经济日报》创办之初和当年有关“让王府井亮起来”报道背景的一些情况时,安老有些激动,两手在不停做着手势。采访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一直蹲在安老的对面,不时会上前凑到他耳边与他交流。采访结束后,与二老聊了一会,樊阿姨拿出当年毛主席曾3次接见安老的老照片给我们看,还有安老一直坚持写的日记本,上面字迹整整齐齐,时有对当下生活的简单评论,在“七一”这天,还专门写了一段小短文,展现了一个新闻战线老党员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和敬佩。我在想,安老的长寿应该和常年动脑思考笔耕不辍有关系吧。最后,安老在签名簿上郑重地签了名,一直微笑着与我们告别。

从三亚采访回来后,收到樊阿姨的短信:“小王同志你好,提出一个希望,即请你寄张采访安老的照片给他,本月20日恰是他94岁生日,留作纪念。谢谢!”我马上挑了两张采访时拍的照片,请离退办代为寄到。几天后,樊阿姨来短信说:“信件照片收到,谢谢!”在20日当天,我给樊阿姨发了条短信:“今天是安老生日,祝安老健康长寿,祝您二老开心幸福!”

社庆宣传片如期做好了,也不知安老是否来得及看过。写这篇稿子时,我把安老的祝福那段又找出来重温了一下:“祝《经济日报》越办越好!”这是他的心里话。他见证了一段历史,他推动了很多事件,他对这个世界、这张报纸满是眷恋和祝福。水有源,树有根,我想许多经济报人也会在心里给他留下一个很高的位置。

安老,一路走好!

附录

《经济日报》告诉《华尔街日报》

□ 李洪波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高兴访问你们的报社,贵报主要刊登经济新闻,和我们报差不多。

安(以下简称“安”):但我们报比你们年轻得多,才两年。不过,中国报纸的年纪要是同邸报联系起来计算,就有两千年历史了。

记:是否能介绍一下你们报纸最重要的报道思想是怎么考虑出来的?

安:《经济日报》是我参与创办的第五张报纸。第一张报叫《胜利报》。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正犯进中国,我在山西当游击队长,当时我是一手拿枪打日本,一手拿笔写文章。1938年,我们建立了根据地,出版了那张报纸,是朱德为我们写的报头。

我遇到的第一位新闻记者就是美国人,名叫史沫特莱。那是1937年,会见是在山西河顺县西拐镇太行山最高的山顶上进行的。

她当时穿了一身八路军的棉大衣,坐在一块石头上和我谈话,对我说:“你应该坐在石头后面,山上的风太大”。史说,“我喜欢风!”她的性格对我很有感染力。她问我,“你对打日本的胜利有没有信心?”我是个年轻人,比较调皮,说,“你为什么到这个山上?到这个山上的人都有信心!”史沫特莱满意地笑了。

记:当时你多少岁?

安:18岁。后来,我又在晋冀豫三角地区出了个《晋冀豫日报》。

第三次是1940年参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那是我们党的北方局机关报。写社论太枯燥,我就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要求到前线去打仗。1945年,我成了新华社特派记者、晋冀鲁豫前线通讯社社长。这期间,我认识了另外一位美国人——马歇尔。当时,我去南京采访停战谈判,我问马歇尔,“美国人为什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马歇尔答道,“我是为和平而来的。”我说,“但愿如此。”战争还是打响了,我们建立和巩固了根据地,达到5000万人口。再往后,刘邓大军南下了,上级要我参加筹办《人民日报》。

现在,我是惟一还活着的《人民日报》创始人。进城时《人民日报》是“三人领导集体——范、邓、安”,现在范、邓已不在人间了,我还活着。《人民日报》报名是周恩来起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我去见他们时,周问,“报纸起什么名字好?”我说,“我愿用《解放日报》。”因为,延安时期党中央的机关报就叫《解放日报》。周说,“应该叫《人民日报》,人民好。”多年来,我接触过的中央领导都告诉我,我们的报纸要为人民。从1945年到1982年,我一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办一份全国性的《经济日报》。这件事从1978年算起、研究准备了3年,许多人参与,终于在1982年让我来筹办。《经济日报》是我参加办的第五张报纸。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来办这个报纸,认为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可以抱残守缺,捧着《人民日报》这个金饭碗,省得担风险。但我没有犹豫,认为应该试一试,现在已经试验了两年零两个月。我不敢说办得完全好,但已经增加了办好它的信心。

这两年多的《经济日报》有几个特点,头一个就是对中央的精神,用我们可以达到的速度最快地加以报道和评论。比如我今天下午回来说,“中央有个精神,明天让这个精神见报”,他们(指当时在座作陪的几位部门负责人——整理者注)这些做编辑的,不论是哪级干部、哪个部门,都完全可以按要求落实。这样,就能让中央精神尽快与各地干部群众见面。第二个特点:我们都提出了一些中央和老百姓都很关心的问题。这类报道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大量的。比如今天(2月7日)的报纸——“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决定,国际海员俱乐部向中国海员开放”,这就是在我们的报纸上连续20天进行报道和讨论后产生的效果。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上海海员俱乐部盖了一个饭店,不向中国海员开放。我们认为,在国际航线上航行的中国海员也是国际海员,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不应该有差别。我们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并且在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持续报道,直到上海的中国海员问题得到解决。总之,这类问题中央

上世纪80年代的安岗同志。

(资料照片)

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指示,也没有任何精神,是我们独立作出判断的。这样做我们是要冒点风险,因为批评都会有阻力。另外,我们还支持一切先进的事物。2月6日的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同日本合作的“大家”药厂,生产的药品质量很好,可一些医院宁愿用低质药品也不愿买好的,导致这家合资企业的好药品都积压在仓库里,生产难以为继。我们认为,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倒闭,就在昨天的报纸上报道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评论,今天又继续报道,明天和以后还要继续下去。第三个特点是,既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又更多地起用年轻人。我们报社人员的平均年龄是33岁,许多部门负责人都只有30岁左右。

记:我想请你回过头来再详细谈谈第一个特点。中央有些会议你们报社可以参加,这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制度与你们不一样,因而美国人对此不大理解。你是否参加中央的会议,或者直接与中央领导对话?

安:重要的不在于我个人是否参加会议,而是我们党有个传统,要通过报纸指导工作。

记:你们中国的报纸是否有级别,贵报与一般单位相比是不是要高一些?

安:我们办报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搞“官气”。我们的报纸是党中央领导的报纸,是中央党报。中央党报共有3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我们已经创造和将要创造几个中国的报业第一:

其一,出版时间是各报最早的。现在,每天下午就能在香港的报摊上买到当天的《经济日报》。要做到这一点,报纸必须在凌晨两点钟之前付印,很紧张,不然在香港就看不到。2月份以来,我们做到了天天都在两点钟之前付印。

其二,第一个用电脑排版编报。下一步还要争取第一个使各个采编部门普遍用上电脑。

其三,发行量的增长速度全国第一。中国的报纸有个惯例,每年的1月份发行量都要下降一些,这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今年1月比去年12月增长了4万多份,2月份又增长了4万多份。去年,我们的发行量月均增长3万份,今年的增长幅度将超过去年。

其四,我们要兴办多种事业。除了《经济日报》,还办了《第三产业报》、《中国花卉报》等报刊。花卉市场不能小看,世界花卉年交易额已达400亿美元。我们还在上海组织了信息交流活动,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

记:据《经济日报》要在香港出版英文版,有没有这个计划?

安:有,正在办。我们已经在香港办了《中国经济新闻》英文周刊,将来还想在香港出经济日报报系的中文报纸,也争取在美国、在欧洲出《中国经济新闻》英文周刊。

记:你们的总书记要求你们的报纸以经济为特色,是不是说可以不注意政治问题了呢?

安:那是指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一般性的政治报纸。我们的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因而,我们要抓宏观经济,抓国际经济,抓经济理论问题,不仅发表一般的经济新闻和评论,而是要在报纸上反映出这“三抓”来。我们去年开了两次中青年理论座谈会,其中莫干山那一次就收到了1300位中青年学者的理论文章,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很重视。今年4月份,我们还要在四川再召开一次中青年理论讨论会,讨论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价格、工资、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层建筑如何为经济基础服务、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等等。

记:对政治问题,你们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安:参与者。我们始终把政治工作视为经济工作的动力。比如精神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搞经济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报社内部,我们也这样要求,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争创一流。现在,我们的报上每天都有一段罗开富从长征路上发回的专电,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已经去访问正在沿当年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的罗开富了。罗开富是我们的榜样,他每经过一个省,都要去看他,看他怎样爬雪山,怎样过草地,怎样采访、写稿。

记:有多少记者能做到这一点?

安:我们要为记者创造条件,让他们得到锻炼,成为记者。

记:你刚才谈了不少报社兴办各种事业的情况,我很感兴趣。但我对另一个问题同样感兴趣,那就是你个人的工作情况。

安:我自己一天要上3个班,白班、中班、夜班。报纸版面的大样,绝大部分我要看,重要的选题得和编辑们一起商定,社论我也参与起草。

记:能否具体告诉我,哪篇社论是你写的?

安:我们是集体撰写,参与定题和写作的可以说人人都有份。

(节选自《安岗同志接受班妮特记者采访的谈话记录》)